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GUOJIA SHEHUIKEXUE JIJIN XIANGMU

主编 魏瀛涛

近代长江上游

城乡

关系研究

JINDAI CHANGJIANGSHANGYOU
CHENGXIANGGUANXI YANJIU

四川出版集团
天地出版社

国

近代长江上游

城乡关系研究

四川出版集团
天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长江上游城乡关系研究/隗瀛涛著. —成都:天地出版社, 2003. 12

ISBN 7-80624-815-3

I. 近… II. 隗… III. 城乡关系-研究-四川省-近代 IV. F299.27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08314号

策划组稿:蓝明春 朱 兰

责任编辑:朱 兰

封面设计:魏晓舸

技术设计:杨 潮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盐道街3号 邮政编码 610012)

印 刷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

版 次 2003年12月第一版

200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规 格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1.5 字数 300千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028)86715665 86659636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清代前期四川农业社会的恢复与城乡关系的构建	(18)
第一节 明末清初四川农业社会的毁坏	(19)
第二节 城镇的重建	(25)
第三节 四川农业社会恢复时期的国家与社会	(32)
第二章 城镇与乡村经济的互动过程	(42)
第一节 土地与人民——城镇恢复和发展的基础	(42)
第二节 城中市与城镇的恢复与启动	(46)
第三节 粮食贸易与市场	(53)
第四节 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城镇市场	(58)
第三章 场镇及其对乡村的意义	(66)
第一节 场镇作为个体的历史存在	(67)
第二节 场镇对于乡村的意义	(80)
第四章 四川中小城市的发展	(88)
第一节 长江上游前近代中小城市的发展概况	(88)
第二节 重庆开埠后中小城市功能的转变	(93)
第三节 城市地域结构的变化及近代市政的举办	(118)

第四节	四川中小城市的规模及发展速度	(123)
第五节	四川中小城市发展的阻力	(130)
第五章	长江上游的大城市	(140)
第一节	长江上游区域中心城市——重庆	(140)
第二节	政治中心城市——成都	(169)
第三节	手工业城市——自贡	(191)
第六章	近代城乡关系的变迁	(205)
第一节	城市对农村的带动	(205)
第二节	重庆开埠后四川城市体系的形成	(231)
第七章	农村制约城市的发展	(253)
第一节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253)
第二节	农村经济结构及阶级结构的变迁	(264)
第三节	农业生产力状况评估	(268)
第四节	农民负担的沉重与农村经济的破败	(275)
第五节	农村发展的滞后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制约	(280)
第八章	人口与社会	(288)
第一节	移民社会	(288)
第二节	人口与物产及物流的关系	(299)
第三节	人口与交通网络	(308)
第四节	人口与乡镇	(314)
第九章	近代人口的变化	(318)
第一节	人口数量大规模增长	(318)
第二节	人口密度的变化	(321)
第三节	手工业与人口	(324)
第四节	剩余劳动力的走向	(327)

第五节 城市人口的变化	(331)
第六节 近代工业人口结构	(338)
第七节 工人队伍构成	(348)
主要参考书目	(355)
后 记	(357)

前 言

在1991年出版的《近代重庆城市史》一书的《绪论》中，我们曾经提出了研究近代城乡关系的问题。认为城乡关系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城市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城市史研究不能仅仅孤立地研究城市本身，必须扩大研究视野，因为“纯粹的城市现象”是不存在的。“在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中，不能仅局限于探讨城市本身的发展，而必须从城乡关系的更广阔的背景来探讨城市的发展”^①。十年以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在2000年将我们申报的项目“近代长江上游城乡关系研究”批准立项，使我们得以进行一个区域内城乡关系研究的尝试。历时三年，基本上完成了这一课题。

一、研究的区域空间与时间跨度

本课题所指的长江上游，是指以四川为中心，包括陕西、云南、贵州一部分长江干、支流的一个地理区域。长江在四川境内长达897公里（即宜宾至巫山楠木园段）。此段长江横贯川南、川东，上接云南，下达湖北，右通黔湘，左达陕甘。可见，四川是长江上游的主体，基本包括了这一区域全部社会经济特征。因此，本课题研究的内容是以四川为重点，旁及有关其他省区。

本课题涉及的时间跨度甚长，着重清初至民国时段。这是因为长江上游以农业为基础的城镇发展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特别是

^① 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第18页～19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四川的城镇与乡村的发展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特点，即在明末清初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中，城镇与乡村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城市鞠为茂草，村疃尽变丛林”^①。“乡镇市集，昔之棋布星罗者，今为鹿豕之场”^②。多数城镇经毁坏而成废墟，人口锐减，田地荒芜。后经康、雍、乾三世的移民开垦，在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城镇才次第重建与发展。其中，行政中心省、府、县城，最初由国库拨款和地方官与绅民捐献资金重建，重点在恢复城池、官衙，由移民或返回原籍的人上营建住房、店铺、会馆、寺庙等。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和农副产品的商品化，在城市逐渐走向繁荣的同时，众多的农村场市或重建，或新兴。这一史实，便是研究近代四川城市发展、城乡关系的特殊历史背景。近代城乡关系是历史上，特别是清代前期城乡关系演变而来的，我们为了比较前近代与近代城乡关系的变化，突出地域历史特色，重视了前近代城镇与乡村关系的研究，用历史事实，强调长江上游地区，农业是城镇发展的基础，是城乡关系的核心。

二、重视城乡纽带——农村场市的研究

清初，四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就是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城镇经济的基础主要是商业和手工业的结合。这种结合建立在城镇周围农业的基础之上。农村用农副产品、原材料养活城镇居民，支持城市手工业和商业，而农村又需要城市商业和手工业供应劳动工具和部分生活必需品，它们之间形成城乡互动互补的经济关系。恩格斯说：“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生产部门。”^③ 马克思也说：“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④ 在前近代，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那时的城市的内容和形式主要是由

① 清顺治七年《四川巡抚张瑄揭帖》，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甲编，第6本，第519页，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② 清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6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册，第28页。

农业生产水平所决定的。到了近代，城乡关系虽有所变化，但就长江上游地区来说，农业仍然是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城乡关系研究，既要研究城市，也要研究农村，但重点在二者的关系。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由于四川与外部交通不便，省内交通则因河流纵横而舟楫畅通，加之省内物产比较丰富而需要交往和互通有无，所以四川与外省区的商品交换仅仅作为补充，处于次要地位，于是形成了省内区域市场的格局。构成区域市场的主体是一个发达的、内向型的农村市场网络系统。这些农村市场属于基层市场，是联系城镇和乡村的纽带。它们是乡村的头，城镇的尾，是农副产品进入城市的起点，也是城市商品销售的终点。这种农村市场星罗棋布在四川广阔的农村，其主要职能是商品交换，首先是为了满足农民的需求，交换他们的产品，也是农民社会活动、文化娱乐的场所。“以至于实际上每个农村家庭至少可以进入一个市场。市场无论是作为在村社中得不到的必要商品和劳务的来源，还是作为地方产品的出口，都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①。它们直接反映农村的兴衰和农民的生活状况以及城市腹地市场的大小兴衰。甚而如施坚雅所说：“根据中国情况描述的这种市场结构看来具有被称为‘农民’社会或‘传统的农耕’社会的全部文明的特征。”“对农村市场的研究还能够帮助了解那些构成对传统体系的背离的变化，这种变化标志着一个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开始。”施坚雅还断言：“在近代中国历史中可以划分的每个阶段中，农村交易活动都应该受到密切的关注——当代共产党领导时期也不例外。”^②可见，对农村场市的研究，不仅对前近代城乡关系的研究，而且对近代城乡关系乃至当代城乡关系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理所当然成为本课题的重要内容，是开启本课题的一把钥匙。

① [美]施坚雅著：《中国农村市场和社会结构》，第5页，见《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施坚雅曾于1949年—1950年间来成都和附近场镇实地考察。

② [美]施坚雅著：《中国农村市场和社会结构》序言。

清代前期，四川农村市场贸易的发展引人注目。在清朝中期，四川大约有三千个农村市场^①，形成了一个遍及四川盆地的区域市场网络。这个市场网络与更高层次的市场和大商业城市重庆、成都相连，组成区域性的甚至跨越省区的商业体系。四川农村社会内部，农村与城市以及其他行业之间的经济交流，都是通过这个市场网络才得以实现的。在前近代，大商业中心城市重庆成为长距离贸易的起点，中、小城市（泸州、宜宾、南充、万县等地）成为地区性商品集散地，农村场市则把广大小生产者联系起来，通过商人作用，将农副产品集中到大小商业城市，进行省内外贸易。“乡非镇则财不聚，镇非乡则利不通”^②。这个商品流通网络对四川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都起了基础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流通网络中，占主体位置的是被列宁称之为“地方小市场的网”^③的农村场市网。其主要作用仍然是作为当地小生产者之间“以有易无”，调剂余缺的场所。因此，这种地方小市场，既是自然经济的产物，也是自然经济的必要补充。前近代四川的城乡关系，农村是主体，农村在经济上统治着城市。在市场流通的主要商品如粮食、棉花、棉布等都是农民生产出来的。因此，农村场市的经济意义大大超过城市市场。城乡的对立表现在农民、手工业者与城乡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之间的对立。

四川城乡关系发生新变化的契机是英国强加给中国的中英《烟台条约》和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两个不平等条约，特别是实施这两个条约后宜昌开埠（1877年）和重庆开埠（1891年），四川被迫向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开放，开始改变封闭的状态，从而发生了“对传统体系的背离的变化”^④。

首先是洋货（尤其是洋纱）日益增多地经重庆输入，造成纺织

① 彭纲贵、王炎主编：《清代四川农村社会经济史》，第155页，天地出版社2001年版。

② 清宣统《广安州新志》卷9《乡镇志》。

③ 《列宁全集》第3卷，第346页。

④ [美]施坚雅著：《中国农村市场和社会结构》序言。

分离，使自然经济开始逐渐解体。四川农村场市、大小城市与外国和本国东部市场的联系加强，商品经济进一步活跃，产品结构有所调整。适合外贸需要的农副产品、经济作物产品的发展，使外贸商品结构基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格局，农村开始依赖城市市场并加强了与城市的联系。缫丝、纺织等新式工业开始在城市出现，城乡分工与差别日益明显。但是，这些城市工业仍然依靠农村市场。“丝厂、缫丝手工工场的发展的基本原料或者说是前提即是种桑养蚕。种桑养蚕者被称为丝农”^①。茶场的原料也来自农村。“茶场、茶号增多带来了城镇的繁荣”^②。于是，四川农村市场进一步活跃而出现了一些近代因素，也出现了重庆这个地区经济中心城市和成都这个政治、文化、商业大城市的近代化步伐的启动。

重庆开埠以前，传统市场的流通基本上是以农村市场为主，通过商人之手，农民小生产者之间实现交换。重庆开埠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深入，四川市场逐步被纳入了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造成的商业剥削网中，逐渐形成了以通商口岸（重庆、万县）为中心，从城市到农村的商品推销网和农产品、原料的收购网。外国资本通过这个商业剥削网，利用买办、买办化商人、旧式商人对广大农民实行残酷剥削，城乡对立强化，乡村农民、手工业者与城市的外国资本家、买办、买办化商人、旧式商人、高利贷者、城乡地主间的矛盾对立加剧。

但是，重庆开埠以后，四川的基层农村场市不但没有衰落，而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首先表现在场市数量的增多，由清中叶的约三千个增加到清末的约四千个。^③其次，四川农村场市的规模普遍有所扩大，每逢赶场时，农民、商贩云集，大市上万人，小市亦五六千人。再次是场市的功能也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专业性的场市并有所发展，如中药材专业市场灌县石羊场，蚕丝专业市场双流县

① 《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3卷，第41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3卷，第55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③ 彭朝贵、王炎主编：《清代四川农村社会经济史》，第155页，天地出版社2001年版。

簇桥镇，烟叶专业市场什邡县方亭镇，万县的桐油市场达 15 个。市场上的交换也开始由使用价值的交换向价值的交换转变。交换的目的是为了利润，为了再生产。这既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的必然结果，又能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服务。

三、近代城乡关系的变化

马克思在分析西欧的城乡关系时曾经指出，中世纪的西欧是“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①。到了近代，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资产阶级已经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②。在西欧的城市史中，城乡关系主要表现为城乡的社会分工以及乡村土地权力与城市货币权力的对立。封建领主居住在农村庄园中，凭借分封制度和庇护制度占有土地，用租税等方式剥削城市。城市则凭借手中的货币，通过商业和高利贷剥削农村，货币权力逐渐成为摧毁封建特权的武器。土地权力与货币权力日益对立，导致了由城市商人、高利贷者和手工业主等组成的市民等级的兴起。他们通过赎买乃至武装对抗，取得城市自治权。封建阶级则日益衰微，终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

在中国，古代城乡之间并没有比较明显的分工。如同马克思所说：“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③ 在古代中国的农村，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作为自然经济的补充，在农村小市场上又活跃着手工业和商业，而不像西欧工商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前近代中国城市中手工业和商业虽较为发达，但是以满足封建阶级的消费为主要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仍有农村那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色彩。

直至近代，由于外国资本的人侵，通商口岸的开辟以及国内资本主义经济的成长，城乡关系才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由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向乡村在经济上屈服于城市变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18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25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第 480 页。

首先，城市经济功能有所发展。中国传统城市功能单一，非经济功能和经济功能相重合，非经济功能大于经济功能。在近代，城市的经济功能增强，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并对农村地区产生了较为广泛的辐射和吸引，扩大了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在长江上游就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从城市到乡村的商品购销网络。其次，城乡之间的社会分工有了较明显的发展，主要表现是工业大多集中在城市，而城市工业所需的原料、市民生活的物资供应又主要来自农村。再次是，城乡差别扩大，与少数大城市的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乡村的贫穷落后。

1. 城市统治地位的确立

四川的近代工业大多集中在城市。从全川而言，四川的工业主要集中于重庆、成都、宜宾、泸州、乐山、南充等地区性商业中心城市，其中尤以重庆为最。1937年，重庆万元以上的工厂为77家，而其时全川有115家^①，即四川67%的工厂都集中于重庆。从具体的行政县来说，工厂（包括手工工场）主要集中于县城。如绵竹县全县工厂作坊共有255家，城关即县城占60%左右。全县有制鞋、制帽、木梳、织布、铁器等手工行业，共计2009户，有80%集中在县城^②。南充县“所产黄丝著名于世，甲于全川，南充缫丝工厂多在城内，在乡下者仅居少数”^③。遂宁工业“全县以城区为中心，计有织袜毛巾织布染布等厂”^④。同时，近代商业也首先在城市产生并主要集中于城市。四川广阔的农村拥有数量繁多的基层市场，但这些市场大多仍处于从自然经济的补充的传统功能向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市场功能转变的过程中，而其中多数、传统的功能仍占主体地位。农村市场主要为附近的农民服务，是农民“有无相易”的场所。从其商品结构上说，农村市场虽然也有一些出口的上产山货或一些近

①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92页—97页。

② 杜受枏等编：《近现代四川场镇经济志》第2集，第344页。

③ 谢澄、李人杰：《南充蚕丝业概况》，载《建设周刊》第10卷，第23—26期合刊，第55页。

④ 《四川日报》第7卷第5期，1935年11月。

代工业品，但数量不多，交易的主要商品是粮食，如宜宾县“农村市场贸易的种类颇杂，不过一般情形，以粮食为主要，所以粮食是农村市场交易的中心”^①。由于四川的自然经济解体极不充分，农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较低，再加上农民的购买力极为有限，因此，工业品只有在城市才有较大的销量。重庆开埠后，对四川市场抱有极大希望的外国资产阶级就发现，“所有进口洋货，也只能满足川省极小部分人口的需要。事实上，我们的洋布主要只供给几个城市的居民使用，例如重庆、泸州、叙府、嘉定，而且几乎全部都为中产阶级买去”^②。到20世纪初叶，在重庆、成都等城市“购买洋货者自属伙顾”，而“民间服用所需土货多而洋货少”^③。

由于城市是商业、工业的集中地，有强大的资金需求市场，因此，金融组织也自然集中于城市。典当业为旧式金融的代表，“典当业之经营，乃普及四川各地，而握农村金融之枢纽”。据对四川53县的典当业的调查，“成、渝、万、叙、泸五处，共计141家，其他各县之质店，共计56家”。“就上数观之，以城市为多”^④。银行为新式的金融机构，长江上游的银行也主要分布在城市。据统计，到1937年，四川历年共设立银行33家，其中有22家设于重庆，占66.7%。^⑤而成都到1934年也有银行及其分支机构34家。^⑥此外，其他城市如泸州、南充、乐山、自贡等中小城市也有20~30家银行分支机构。银行主要集中的城市，“对于农村经济，仍难发生惠助关系”^⑦。这样，工商金融各业在城市汇聚一堂，这种聚集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又远远超过工商各业自身单独所产生的力量，使城市具备了更大的吸引力。如民国《遂宁县志》所载：“今时以重庆为商人大战

① 杨子英：《宜宾农村之研究》，载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大陆上地问题资料》第42册，第21304页。

② 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第185页。

③ 《四川教育官报》清光绪三十四年第1册“公牍”。

④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第21页，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刊。

⑤ 隗灏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第292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⑥ 何一民主编：《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第257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⑦ 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第44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场，遂宁之大商巨贾，挟重资往来重庆，而输其货于成都，战成都者十之八九。”^① 城市成为了最先进的生产力的集中地。虽然这种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在近代还没有占据主体地位，但它却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必然趋势。这种方向和历史趋势使城市在与农村的对峙中地位不断提高并最终成为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统治者。

随着近代工商各业及近代教育机构、新闻出版媒体在城市的集中，城乡之间也由古代的无差别统一而开始变得壁垒分明，城乡差别逐步扩大。就以商品价格来说，城市与乡村的差距也很大。“中国市场尚有很重要之特点，即是城市与农村间价格之悬殊。譬如茶，其间的差异，有时达到了百分之一千；丝与棉在城市的价，常两倍于农村的价格；至于花生等，则城市和农村间的差异，为百分之一百五十至二百。此其故在运输费、厘金、苛捐杂税、预防抢劫的商人保险费、军需征发等，这些都有重要的关系。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地方市场之闭塞的性质，运输之不发达，农村生产者之破产，城市商业资本之联合战线，是和这个生产者相对立的”^②。

2. 城市对农村的带动

近代城市是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各种力量和因素的集中区。正如马克思所说：“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要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③ 列宁也说：“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④ 城市集中了区域的先进生产力和巨大财富，成为推动区域乡村经济发展的动力。

首先，农产品的外贸提高了农村的商品化率，活跃了农村经济，而城市在其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前近代，长江上游与区域外就有一定的经济往来。据估计，鸦片战争前夕四川每年的对外贸易商

① 民国《遂宁县志》卷25《团警》。

②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292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6页。

④ 《列宁全集》第19卷，第264页。

品流通额不低于 2000 万两^①。一些处于水陆交通要道上的城市，如水路的重庆、宜宾、泸州、夔州等城市，成了长江上游地区的农副产品和区域外进口商品的集散地。

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入侵的深入，长江上游农村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农副产品大量出口，使许多原来弃之不用的东西身价百倍，比如猪鬃和桐油。四川猪鬃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弃之不用的东西。重庆开埠后，出口量大增。到 1913 年，猪鬃出口量增至 15255 担，价值 877551 关平两。^② 国际市场对猪鬃的需求大大刺激了农村的养猪业。民国初年，川南泸州每年出口猪鬃约 1000 担，价值 37 万元。^③ 在成都平原的崇庆县，养猪已成了农民重要的副业，“县中每月可出肥猪 3000 只”^④。桐油也是这样。桐油是油漆不可或缺的材料，四川有大量的野生桐树，但在民国以前，四川桐油仅用来涂饰木器、舟车、雨具、油布等。随着欧美工业化的发展，对桐油的需求量剧增，四川桐油开始出口。到 1917 年，四川桐油外运量已达 37700 担，到抗战前夕，更增至 681451 担，货值达 2735 万元^⑤，超过生丝成为四川最大宗的出口商品。在抗战前，仅万县一带“间接、直接以桐油过活者，至少在十万人以上”。经营桐油贸易的小商人，“在乡多为农民”^⑥。

农副产品的出口，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大大活跃了农村的经济，而城市则是域内农副产品的集散地、转运中心和消费地。重庆开埠以后，外国商人及中国出口商纷纷在重庆、万县等城市设立收购山货土产和推销洋货的行号。“重庆是川省重要商业中心，所有殷商大贾的总部都设在这里。有些商号在位于重庆和宜昌道上的万县，省城成都设有分支机构，很多商号在收购季节派人到产地收购出口货，

① 谢放：《开埠前后重庆进出口贸易的演变》，载《一个世纪的历程——重庆开埠 100 周年》，第 280 页—281 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2 卷，第 398 页，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③ 民国《泸县志》卷 3。

④ 民国《崇庆县志》卷 10。

⑤ 彭通湖主编：《四川近代经济史》，第 194 页，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⑥ 《万县之桐油业》，载《四川经济月刊》第 3 卷第 3 期。

如保宁、嘉定、灌县的丝和麝香。进口货都是从重庆分发来的，通常分成小包，卖给那些行商小贩，由他们供应农村地区”^①。生丝是四川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每年“初夏的时候，绵州、保宁、成都、嘉定和重庆的‘丝贩’，纷纷赴各乡村市场‘收蚕茧’，并购买当地出产的丝。在四川，蚕丝生产像所有其他作业一样，是‘零碎经营’的，商贩们像做鸦片生意一样，在这儿收一斤，在那儿收几两；农民通常出售蚕茧，不另行制丝”。农民生产的是最初级的产品，而蚕茧要集中到城镇，再变成生丝，然后销售到城市市场或出口。在近代四川，出口的农副产品数量的增加，是农副产品商品化提高的主要原因。而在农副产品出口数量增加的过程中，城市无疑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不仅如此，出口产品的加工也越来越集中于城市。就生丝的出口来说，“缫丝自然是技术劳动，就我所知，愈来愈趋向于把蚕茧收集到较大市镇上去缫丝。绵州擅长此业，最上等的‘过盆’丝就是出自该城的”。丝绸也是川省与域外贸易的重要商品，“全省的丝织业愈来愈集中于成都，这儿不仅依赖成都平原供应原料，而且依赖保宁和川北各地，实际上，依赖于本省每一个产丝中心”^②。城市就是通过农产品商品化率的提高来带动乡村发展的，以至于在城市附近，由于农产品的商品化率更高而农民的境况明显好于离城市远的农村，如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四川北部，“农村的状况较前大变……现在呢，除了城市附近而外，多是贫农”^③。

其次，在近代，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网，城市市场左右着商品价格。重庆是贸易的主要市场分销中心，“每年在一定的季节里，商人从偏僻和辽远的城镇如成都、保宁府、潼川府、遂宁县、嘉定府、叙州府、绵州、合州及其他重要地方，有的由陆路，有的由水路来到重庆，运来他们的土产——鸦片、药材、生丝等，并运

① 《重庆海关1892年度报告》，载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第169页。

②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第3册，第1496页。

③ 黄圭一：《川北农民现况之一斑》，载《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第27页，1927年8月。